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在震撼着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带来剧烈的冲击。面对新的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开始发生嬗变，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这种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可以从“安全与发展”“陆地与海洋”“国家与世界”“目标、能力与手段”等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 安全与发展

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代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注意到发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逐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深刻教训。与此同时，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对发展的认识也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限，开始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商业与贸易的兴起往往被认为是对于农业生产与发展的严重危害。而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损害则被看成是对“国本”的动摇，进而可能会危及国家与政权的安全。因此，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往往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国家安全政策，并通过“闭关锁国”和“迁界禁海”等手段来抑制海外贸易的兴起，以此来保证农业生产规模与粮食产量的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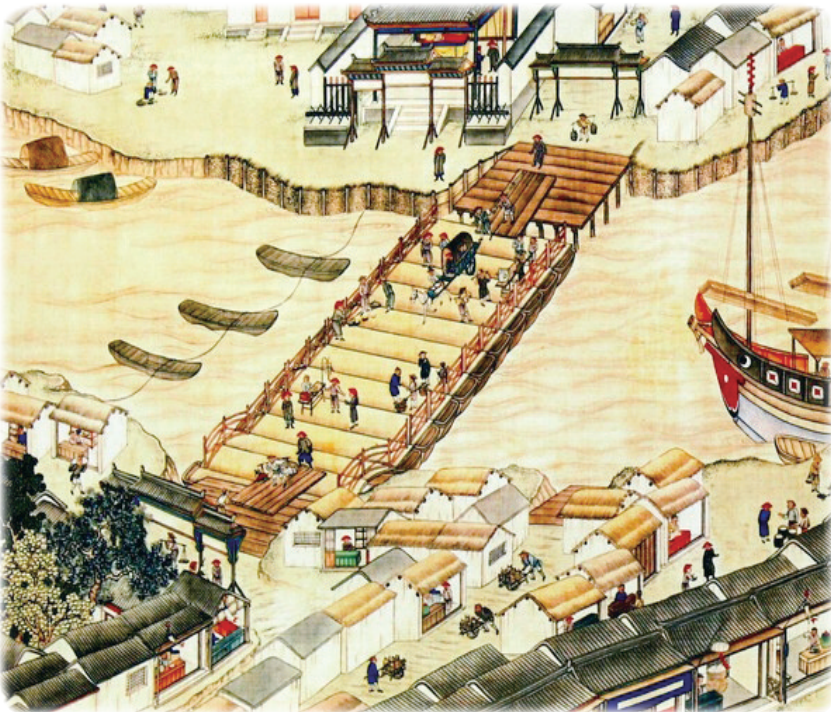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近代的战略思想开始“开眼看世界”，并逐渐意识到，单纯的“足兵足食”已无法满足近代的国防需求，必须要大力发展商业和贸易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尖锐地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以商业与贸易为主题的发展观念开始逐渐渗透进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之中，并促使其发生嬗变。以此观之，清末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的行动则可被看作是一种对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以发展求安全”理念的实践。

### 陆地与海洋

从“陆地与海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对“海防”重要性的认识比之以往有了

## 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

□王 熙



长足的进步。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比较重视国家的陆上防御，而对海上防御的重要性往往缺乏清晰的认识。

彼时，海上防御只被看作是陆上防御的有限补充，其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确保国家沿海地区陆上疆土的安全，因此也多采取一些消极防御的措施，比如迁界禁海。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多次从海上攻破中国的门户，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给清政府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国防理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此，清朝统治者中的部分开明官员日渐注意到消极海上防御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纷纷要求变革国防观念并加强海上防御。

1866年，左宗棠在呈递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指出：“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这一奏疏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明确地指出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

1874年，李鸿章呈上《筹议海防折》，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均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筹议海防折》建议从国家总体层面加强海上防御并筹建近代化海军，是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嬗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当其时，中国的西北边疆正面临着阿古柏“政权”及其背后列强势力的严重威胁，而清朝的东南海疆亦存在着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从海上侵入的潜在危险。就陆上防御与海上防御孰轻孰重，清朝统治者内部开启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辩。围绕上述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辩论的难解难分。最终，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为“海防”与“塞防”之辩画上了句号。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家安全战略。近代中国陆地与海洋并重的安全战略布局也初露端倪。

### 国家与世界

从“国家与世界”的角度来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清朝闭锁的国门，也震碎了清朝统治者一

直以来所拥有的“天朝上国”的虚幻优越感。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都秉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长期对所谓“化外蛮夷之邦”保持着心理上的优越感，梦想着构建一个“万国来朝”的理想局面。在这种心态下，中原王朝在对外交往上往往持有消极被动的态度，对了解“藩邦”的“风土人情”则更为不屑一顾。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数次对外战争的失利慢慢销蚀了这种虚幻的优越感，国人逐渐对本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日渐意识到这种与传统秩序观截然不同异的世界格局和“天下大势”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官员们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西方，甚至是学习西方。

张之洞曾在奏折中称：“窃臣前因海氛粗定，愤兵事之不振，由疆圉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御侮之资。”李鸿章更是指出：“自古用兵，未有不知知己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一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於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这些思想与呼声都促使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并开始发生某种嬗变。自此，中国逐渐走出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的局面，开始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与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和互动。对此，孙中山先生曾精辟地评论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 目标、能力与手段

最后，从“目标、能力与手段”的角度来看，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逐渐认识到战略能力综合化和战略手段多样化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进行战略谋划时更倾向于遵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原则，认为只要正心术、走正道（拥有一个良好的目标和愿景）就会自然而然地取得成功，从而忽视了能力和手段的重要性。另外，在传统狭隘“重农”思想的影响之下，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长期将商业和技术视为“末业”和“末技”，甚至因此促成了“士农工商”这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分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对这种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仅有良好的战略目标和愿景并不能真正有效确保国家的安全，还必须拥有贯彻执行战略目标的能力和手段（在当时主要是指经济实力 and 军事工业技术）。

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郑观应则强调以商立国的重要性，称：“可知预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刘铭传上奏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赋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这些都标志着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开始走出了“重本抑末”和“敏于筹划而穷于手段”的误区，开始将商务、工业和科技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 诗中情话诗外『疫』

□马永鹏



【宋】李唐《艾炙图》（局部，又名《村医图》）。反映了宋代民间医生以灼艾救治病人时的情景

“人生无贤愚，飘飘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免危其身。”（唐·杜甫《寄薛三郎中》）古代疫病多发，很多诗人都曾饱受疫病之苦，他们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关怀生命、忧国忧民是永恒的主题，豁达乐观是诗人不变的人生态度。面对疫情，诗人们书写自身经历，观照世间百态，用诗中之情，话诗外之“疫”。

### 叹人生之疾苦

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疫病治疗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人们不仅要面对病痛，还要忍受治疗之苦。

在古代，灼艾是治疗疫病的一种常用方法，人们将艾叶捣干制成艾绒或艾柱，燃烧后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唐代韩愈在《谴疟鬼》一诗中记载：“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醢

若猎火围。沮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可知在唐代，灼艾作为治疗疫病的方法就已经广为使用。

相对汤药而言，灼艾的效果最为显著。然而这种方法却隐藏着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人们一般不轻易采用，多把它当做万不得已的之下策。南宋陆游曾身染疫病，“老境侵凌病满躯”，久治不愈，不得已而灼艾，但却“计出火攻伤老病”（《久病灼艾后独卧有感》），不过好在“火攻下策得枝梧”。通过灼艾，诗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小愈之后便沽酒买醉，“沽来村酒初判醉，叱去山童不遣扶”（《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答客问病》一诗中也说：“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可见灼艾之功更胜于药石。

事实上，灼艾的功效虽好，但过程却疼痛难忍，很多诗人都不堪其苦。南宋朱弁谈及自己灼艾的经历：“烟微初炙手，气烈渐钻皮。闭目书徒展，支头枕屡移。发狂还自晒，贾勇仅能支。宋鹊追风日，吴牛喘月时。”（《予以年事渐高气海不能熟生煖冷旅中又无药物遂用火攻之策灼艾凡二百壮吟呻之际得诗二十韵》）灼艾之下，诗人体无完肤，彻夜难眠，惟有通过吟诗以消身心之痛。面对灼艾之痛，南宋郑清之不禁发出“四千八万陀罗臂，艾炷教君何处安”（《臂疼医令灼艾戏成》）的感慨。

除了病痛，诗人还要忍受卧病隔离的精神之苦。南宋淳熙十年，范成大因病致仕，一病就是三年，“三年归汶上，千日卧漳滨”（《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卧病期间，诗人久居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三椽卧衰疾”（《甲辰除夜吟》）。起初他还享受这种卧病的悠闲，“当时想倦闭门闲”（《甲辰除夜吟》）。可是没过多久，这种闲居就变成了困居，以致

“因病偷闲意属厌”（《丙午新年正书怀十首》），心痒难耐，不禁想要出去走走，“脚底关山如梦中”（《甲辰除夜吟》）。在病痛和精神之苦的双重折磨下，诗人日渐消瘦，“骨枯似槁柴如腊，发织成毡鬓作蓬”（《谢范老问病》），“皮下多无肉，秋来瘦不禁。骨棱春焙筠，筋磬海山沉”（《自咏瘦悴》），精神也一度崩溃，甚至萌生了“人应见怜久病，我亦自厌余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以自嘲》）的念头。

### 哀民生之多艰

在古代，瘟疫和战争、饥荒、洪灾一样，是致死人数最多的灾害之一。瘟疫所到之处往往是尸横遍野、十室九空。两汉乐府诗《古步出夏门行》曾记载当时瘟疫肆虐下的民间惨状，“白骨不覆。疫疠流行。市朝易人。千载慕平”。

瘟疫面前，命如草芥，民生堪忧。诗人们不止关心自身的安危，同时也心系百姓，忧民之所忧。范成大三年卧病期间，亲眼目睹了“十家九空”的民间惨状。他直斥天地之不仁，并作诗体怜百姓：“疲甿愈矣可更病，我作此诗当感神”（《民病春疫作诗悯之》），希望可以感动神灵，驱散瘟疫，还人间以清宁。

也有诗人通过写诗的方式上书朝廷，为民请命。明代龚羽在《甲戌民风近体寄叶给事八首》中记载当时的一次瘟疫，“疫病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露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洪水、瘟疫、饥荒并作，百姓流离失所、死者如蕉，诗人亦是沟中之瘠、百病缠身。受疫情影响，“薪米价高同白金”，灾民无钱无粮只得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出现了“苻粉磨成连浊土，榆皮剥尽到深根”的惨状。有感于此，诗人“半因忧已半忧人”，接连创作了《甲戌民风近体寄叶给事八首》《民风绝句寄

叶给事五首》等十几首诗歌，向朝廷反映民情，恳请拨款赈灾。当得知朝廷免除了当地的赋税，诗人喜不自胜，“不忧鞭挞烂皮肤”。

为防治疫情，政府通常会采取一些检疫措施。然而措施不当，苦的还是百姓。清代洪儒在其《检疫叹》中对检疫官凶狠残暴、不近人情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控诉：“检疫入人家，横将老幼驱。刀圭及针药，剖割死人肤。云欲免传染，须焚死者躯。到处人惶惶，有病应受辱。不许在家养，病院非虚拘。或有讳病人，一死如偷爵。亦有无病人，羸黄以病诬。封守死者家，禁锢七日踰。”疫情面前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但无病被诬为有病，“疫死柔于水，检死暴于火”，这种行为岂不比疫鬼更可怕？百姓“偷生”且无路，苦疫更甚于苦贼。面对这种情形，清代许梦行感叹道：“民生到此计已蹙，爱护无端多杀戮。病疫之家不敢声，死疫之家不敢哭。不经丧乱苦，不识升平福。不遇旧恩宽，不知新法酷。”（《苦疫行》）可怜民生之艰、百姓之苦无人可诉。

疫情当前，诗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能体现他们的忧国之心、报国之情。南宋名臣王十朋在泉州任职期间，“入境身即病，到官日呼医”（《乞朝不允》），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灼艾，以致出现“臂疼如子美，齿落如退之。脚患柳州肿，发垂孟郊丝。饮食日减少，跬步须扶持”的症状。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情，诗人虽不堪其苦，却仍思报国之心。他说：“沟壑尚未填，报国犹有时”，恳请朝廷准其致仕养病，以备来时报国。

### 聊自嘲或互勉

面对疫情，诗人们往往展现出豁达乐观的一面，他们以自嘲或自勉的方式来纾解病患之苦。范成大三年卧病期间，虽偶有“因病偷闲意属厌”

的感叹，但依然保持了豁达乐观的心态。他戏书自己得疾千日：“百年能有几春光，只合都将付醉乡。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万五千场。”（《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面对顽疾，旁人已不堪其忧，他却心犹始孩，无忧无虑，似乎已然忘却了形骸。他乐观地说道：“除寒会退闲，一笑当安排”（《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作》），功名利禄、生老病死，一笑置之。

面对疫情，诗人之间也相互劝勉。唐元和十年，元稹被贬通州，刚一到任，白居易就写诗提醒他，通州“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疠多”（《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盼他千万爱惜身体。然而造化弄人，元稹还是不幸感染了疟疾，以致“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瘧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白居易得知后，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多次作诗慰问，“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漫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壮志因愁减，衰容与病俱。相逢应不识，满颌白髭须”（《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元稹也给他回诗，“秋茅处处流瘵疴，好友寄来的衣物也不合时宜，但这份情谊诗人却铭记在心。

自嘲也好，互勉也罢，都是诗人笑对疾病的一种表达。他们借诗抒怀，苦中作乐，即使在疫情笼罩的日子里，也依然诗意地生活。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应该向诗人们学习，以更加积极、乐观、自信的态度应对疫情。正如范成大病中所言：“已把宜春屡胜，更将长命题幡。”（《朝中措》）春天既已到来，阳光还会远吗？